

戎马英姿的吴西将军

方悦高

吴西，原名吴有良，系扶绥县渠黎镇三哈村人。生于1903年10月3日(农历八月十三)，中农出身，学生成份，中师文化，壮族。大革命时期参加学生革命运动，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改名为吴西。1930年2月参加红八军龙州起义，1955年授少将军衔，1964年奉命离职休养，今年92岁，健康如常。



吴西将军，不愧为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当他进入本县吉阳小学读书，正是“五四”运动推向全国，他积极参加宣传新文化运动。1925年至1927年，在南宁市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担任学生会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领导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4.12事变”中，吴西也同其他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被捕入狱。他虽不是革命的中坚分子，但革命意志非常坚强，横眉冷对敌人的淫威，使敌人无可奈何。本来敌人想将他杀害，但因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才将他改判监禁。1928年1月，他获得刑满释放。出狱后积极寻找革命队伍，要求分配工作。党组织鉴其在狱中的表现，在南宁分配他随部队上龙州发展革命组织。从而，于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参加红八军龙州起义。

红八军在龙州遭受挫折后，他即随部队转战宁明绥禄并由南庆、柳桥，出那僚过扶南的那练、东罗、蕾陇、渠黎，从渠黎过岂盆出苏圩、吴圩。在钦州打散后，随领导转移到香港参加党的学习班。不久，又奉命护送党的负责人邓拔奇回广西找红七军传达中央精神。当时，吴西家有父母、妻儿和三个弟弟、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为了革命三过家门而不入。在护送领导找到红七军后，他即随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北上。在转战千里的小长征中，他不幸在湖南乐昌河边中弹挂彩，经组织安排他到湖南桂东老百姓家秘密养伤。在伤愈后，立即寻找部队。他为了找到红军，化装成讨饭儿一路追踪寻找。经过千辛万苦，避过敌人岗哨数次的盘查，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吴西回到红军后，服从组织安排，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六师敌工科长。他大胆地深入敌营做好策反工作，甘当无名英雄，促进在江西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因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造成了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作出“战略大转移”，他随队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他仍任敌工科长，每次行动都担任先遣队，并亲自带一个连走在前卫。为红军长征斩关夺隘，飞越天险，翻过雪山，跨过草地，做好探敌问路的艰险工作。吴西到达陕北后，被调到红二十八军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不久又改任敌工科长。在军长刘志丹的领导下，开赴山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他以敌工业务专长，打入“哥志会”，做好哥志会众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会员提高政治觉悟，投身于红军队伍。他到宁夏平凉地区，以单刀赴会，招抚了各地股匪，为地方除害，又发展了革命力量。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下，不得不接受我党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签订了共同抗日的协定，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因而，红军进行整编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路军）。吴西奉命调到一二〇师，初时在师部代理敌工部长，不久，又调到三五八旅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七·七事变”后，在贺龙的领导下，穿过日军封锁线的同浦、平汉铁路沿线，进入冀中平原建立抗日根据地。吴西到冀中后，被调到冀中军区第二军分区任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兼第八支队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司政机关住在定南县，主要辖蠡县、博野、安平、深泽、无极、安国、新乐等县，总面积为4862平方公里，人口约120万。配合地委、专署，搞好发展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保证部队物质供应。从1939年至1942年间，军分区发展总兵力一万多人，其中建立了主力部队两个支队共五千五百多人。地委掌握的游击纵队、各县大队、各区中队为六千多人，给日军以致命的打击。

1943年2月，吴西调到延安高级党校学习，担任第七支部书记。这次学习又称延安整风学习，主要是学习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论著。吴西在学习中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按照毛泽东同志创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帮助同志，为革命搞好大团结。1945年4月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吴西和帅荣作为冀中军区代表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历史性地听取和审议通过中央各项报告，选出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首的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解放全中国的新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吴西从延安调到晋察冀边区，再回冀中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做好一个军区的政治工作，开展接收日军投降有关事宜。随后同

共两党谈判破裂，蒋介石实行独裁，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原抗日的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个边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开展解放战争。吴西调任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为解放战争培养大批军政干部。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秋，根据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叶剑英的命令，吴西调到第十八兵团随营军校担任政治委员，随即进军西南，解放成都，在川北收编和改造国民党军官三万多名。

全国解放后，调任川北军区（后改为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1952年秋，党中央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吴西接受军委命令，带着部队五百多人开赴青岛，组建海军潜艇学校，并担任政治委员。1954年任东海舰队政治部主任，1955年中央授予少将军衔。1957年夏任海军政治学校校长，1958年在海军政治部任检察长，1959年调任全国海军后勤部副政委等职。为我国建立强大的海军，在政治工作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

1964年10月，由于患有淋巴结核症而奉命离职休养。吴西将军不因休养而消沉，他坚持革命军人的本色，按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锻炼身体，写好革命回忆录。直至1988年6月，把自己戎马一生的经历写成《老骥忆烽烟》一书，共206000多字。得到胡耀邦、杨成武、程子华、萧克、廖汉生、伍修权、孙毅、王平、莫文骅等党政军领导的题词赞扬，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把革命优良传统传给后代，成为我国党史、军史的宝贵财富。

张报传奇 国际家庭

方悦高 谢乃智

张报同志，原名莫国史，又名莫震旦，系扶绥县城人。他生于1903年11月5日，父亲汉族，母亲壮族，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三）和两个妹妹，家庭较为富裕。他读过南宁省立第三师范、北京清华学校、北京民国大学、上海通惠工商学校，天津南开大学，最后毕业于北京国立师范大学研究班，并留学美国和苏联。1928年2月加入美国共产党，1932年10月在莫斯科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回国初任新华社俄文组组长，后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专家，已离休，现年92岁，健康如常。

张报从小聪颖，1918年县立吉阳高小毕业，即考取南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0年随即考上北京清华学校。这所学校是清王朝建立留下来的，那时不称大学，但学制八年，凡进入清华读书毕业，就是要准备出国留学。张报为了求学，曾写信给父母提出解除他十岁时与十三妹的封建婚约，但其父母没按他的想法去办理。过后，他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向学校写出一份意见书，由于言词过激，学校当局随即开除他出清华学校。他不甘绝学，便改名为莫震旦考入北京私立民国大学，又因为私立名气不大，1921年冬，赴上海考入惠通工商学校。第二年天津南开大学向全国招生，他又考取全国第一名。南开大学与清华学校相仿，许多课本全用英文，后又受到“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1924年离开了南开，再投考北京国立师范大学研究班，专攻教育行政，毕

业时获学士学位。1926年，自费赴美国田纳西州的皮波迪师范学院工读。从而，走上了光怪陆离的世界。

在美国自费工读期间，曾与留美的清华进步同学交往，开始服膺于马列主义学说。在同学的帮助下，于1927年夏季领到了广西留美学生的公费，随即转学到密执根大学。第二年初，又转入威斯康星大学。此时，他听到国内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感到极为愤慨。从而，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的革命活动，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他被派到纽约担任美共中央党校秘书，负责领导学校工作，同时担任华侨反帝大同盟总部常委和大同盟机关报《先锋报》编辑。随后，又担任美共中央宣传部委员、中央语言部委员，中央中国局书记等职。在革命活动中，还与翼朝鼎合著出版《苏维埃中国》一书，介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情况。1929年夏，他被派到克利夫兰市出席美国统一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并作了祝贺词，被警方密探发现企图将他逮捕。当时他已脱离学校，失去留学生资格，按美国法律已属非法移民，“无权”居留美国。在关键时刻，有位美籍姑娘机警地解救了他。这姑娘叫玛莉·梅，是美共青团员，在该市义务发行《先锋报》，对张报很有好感。1930年玛莉被调到纽约工作，并进入工人学校学习。张报和玛莉同在一起，彼此相爱而同居，建立了第一个国际家庭。1932年夏天，警方探知张报在工人学校工作，便派警察突然闯入校室，企图将他逮捕送交中国反动政府。幸得秘书朱迪斯察觉，掩护张报逃出。由于张报在美共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在继续活动。经美共中央决定，护送他到苏联共产国际以便返回中国参加革命斗争。因此，张报与玛莉只能痛苦地分离。在美共中央的安排下，从纽约取道英国伦敦、法

国巴黎、德国柏林，经于10月初到达苏联莫斯科。

张报在莫斯科经共产国际同意，将他转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决定先送他到列宁学院中国部高级班学习。由于张报在美国留学时通用的名字是莫震旦，按照共产国际秘密工作条例规定，要他改姓换名，而当时他正看着报纸。随即改为张报，一直沿用至今。

1933年，张报在列宁学院学习，玛莉从美国到莫斯科与他团聚，并带有身孕。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张报受到了严厉的审查，连过党的生活都无权参加。为了使玛莉和将要出世的儿女避免受株连，极力劝告玛莉返回美国。在当晚即将分离的时刻两人商量为日后有幸相遇之便，先给未出世的儿女安上名字，若生男的就叫菲利浦，若生女的叫维多利亚。这两个英文名字含着“英雄”和“胜利”。玛莉回美国后，张报也被流放到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劳动。过后接到玛莉的来信，知道生下了女儿维多利亚。后来由于“左”的路线，随即失去联系。直到1935年国内红军长征到遵义后，通过否定王明、博古左倾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地位，这个新的形势，很快传达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部也改变了对张报的看法，马上电召张报回莫斯科分配工作。让他协助廖焕星筹办、编辑出版中文的《救国报》实际上是副主编工作。张报协助出版这刊报纸，为推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海外华侨开展抗日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1936年他又结识了在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任秘书的娜佳·阿维丽雅洛夫娜·鲁登科。这个姑娘是俄罗斯乌克兰族人，对张报发生了好感，张报又对他爱慕。1936年5月1日便一起同居。在那个年代，革命者中间的婚姻，没有什么规章制度，也没有实行登记手续，只要相爱就

成为“事实婚姻”。张报和鲁登科结婚后，于1937年2月4日生下了儿子华列利·张·鲁登科，意为张、鲁所生的华列利。但是，苏联那时正在开展肃反运动，扩大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株连了成千上万在苏联工作的外籍人。1938年2月，张报同其他人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捕，放到塔干卡监狱中，冤枉地度过两年半的铁窗生活。1940年夏天张报才被判8年徒刑，并押到西伯利亚赫塔小镇的砖厂监督劳动。世界大战爆发后，又再被流放到最冷的叶尼塞斯克石油厂。此时，其妻子鲁登科也被株连，带着幼小的儿子流放到苏联的最南方。1946年张报名誉上得到释放，释放证书上写的是“自由佣工”，但限制在萨迪卡城范围居住和工作。张报要求返回中国，但苏联当局不准。为了谋生，张报被迫到附近农场打零工。不久，又到乌希库尔兰姆小镇的家具商店谋生。在意外之间，接到鲁登科来信，倾诉了十几年对他的怀念，并准备在假期赶到乌镇与张报会面，使张报在艰难的道路上充满了信心，有争取返回祖国的可能。可是，1948年12月，苏联进行肃反复查，张报又再次受到逮捕。在未经过宣判的情况下，就押到叶尼斯克镇林场监督劳动。直到1955年11月，苏联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许多冤案才得到昭雪。张报得到平反，恢复了一切名誉。

张报得到平反后，虽与妻儿团聚了。但思念祖国、报效祖国的心情时刻激荡着他。鲁登科了解张报的心情，她为了日后办理手续随丈夫到中国定居，便拉张报到莫斯科当局补办了结婚登记手续。张报回国心切，先于1956年2月春节前夕回到祖国北京，得到中央、国务院的欢迎。不久，组织上将他分配到新华社俄文组任组长，负责组建俄语对外广播发稿工作。这年“五一”和国庆两次节日，他光荣地登上天安门

城楼观礼，受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7年2月，张报双喜临门。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王明、康生于1934年在莫斯科清党时给予张报的错误处分，确认他的党龄从1928年在美国入党时算起；第二件事是鲁登科得到苏联的鉴证，来中国与张报团聚，组织上分配她到新华社工作。1962年初，张报又调到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任专家，负责翻译定稿工作。此时，张报思念故乡，第一次返回扶绥县探亲，途中遇见小时订婚的黄十三妹。这时，十三妹已经60岁了，她几十年来一直吃斋念经，独守青灯拜佛，牺牲了青春年华，为的是守着张报而感到自豪。张报看到此情此景，内心感到难平。又可惜她，更同情她。从而，每月付给她部份生活费，给她颐养天年，这是人之常情。

随着形势的变化，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日趋严重，张报的国际家庭也产生了分歧。鲁登科借着儿子、儿媳、孙子还在莫斯科为由，便于1964年秋返回苏联。“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张报又被扣上“国际特务”的罪名，停发了工资，进入牛棚被审查。迫于无奈向北京中级人民法院提请与鲁登科离婚，才得缓解一步。此时，十三妹得知张报受难而且有病，便将原张家订婚时送给她那副金耳环变卖作路费，搭火车到北京去护理张报。张报得到她的护理，感到无尽的温馨。但不久，风云再起，张报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因而，十三妹无法在他身边，无奈含泪告别，返回南宁。1973年，张报在干校获得“解放”返回北京，恢复了党籍及工作。得到补发工资5000多元，一次交纳党费3000元。尔后，为怀念十三妹，写成一部六百行的长诗《我和十三妹》发表在《广西文艺》刊物上。十三妹去世，张报拨给一笔钱给黄家作安葬费，并于1991年7月带着再婚夫人岑惠心返国

故乡渠黎镇那隆村的十三妹墓前祭悼，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品格。

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使中国大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虽然离休了，但他的忠于祖国不变。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张报在莫斯科的儿子华列利（是个工程师、画家）儿媳妇李雅兰（李立三次女）、孙子阿春卡和在美国的女儿维多利亚，时常怀念着他。承着大好的时光，多次回国探亲，使这个国际家庭在中华大地发扬光大，快乐团聚。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甘苦传略

方悦高

甘苦，原名甘华明，1924年1月生于扶绥县渠旧镇渠旧街的一个壮族家庭。自幼读书，高中毕业。1947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江地区游击队，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93年3月27日，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于1993年7月25日因病在南宁逝世，终年69岁。

他青年时期，思想进步，向往革命。在南宁读书时，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声援抗日战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高中毕业后，于1946年秋任扶南中学教师。鼓励学生进步书籍，反对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1947年春调任龙州中学教师，秘密参加党领导的地下活动，于同年6月投笔从戎，担任共产党领导的左江游击区民兵大队教导员。1948年调任中共凭祥县工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他在中共左江工委的领导下，积极发展革命组织，掀起革命高潮。1949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左江支队第三团

政委。他在左江支队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转战于凭祥、龙州、大新、天等、崇左等地区，前后与国民党反动武装激战40多次，特别在1949年6月，他指挥部队解放养利（今大新）等县城，并于同年7月在八万桥战斗中，消灭了国民党“剿共三县联防司令”冯如惠的反扑。在这场战斗中，共击毙击伤国民党三县联防部队300多人，活捉了联防司令冯如惠等官兵近百人，使国民党在左江地区一败涂地，为迎接广西全面解放打开了新的局面。

1949年12月广西全面解放，甘苦出任龙津县人民政府县长。随着革命工作的需要，调任中共龙津县委副书记、书记。在此期间，他领导全县剿匪反霸、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因而，于1955年提任广西省手工业局副局长，参与领导全省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于1957年完成了全省手工业合作化任务。1958年初，又服从组织的安排，下放到龙州，重新担任中共龙州县委第一书记。当时，他已是地厅级干部职务。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坚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教导，做好本职工作，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59年1月至1962年5月，中央批准扶绥县与崇左县合并，甘苦调任中共崇左县委第一书记。在此三年中，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发生最困难的时期。主要是由于党内受到“左”的影响，在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工作的过程中，刮起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五风”。因此，生产遭受到破坏，干群关系形成紧张，人民生活水平突然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一个县的工作，无疑难度是相当大的。但他非常注意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

讲假话，反对强迫命令等不正之风，如1959年冬，上级指示要开展搞粮食“反瞒产”运动。他领导开展这个运动，善于掌握政策，尽量减少伤害基层干部和群众。他亲自到江州公社蹲点，首先与公社党委商量，召开公社党员会议，讲明政策，认真分析产量。亲自分别找大队干部座谈，了解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他对公社党委负责人说，什么事情都有个限度，这就是政策。差多的要在思想工作上下点功夫，已经差不多的，就要适可而止，搞过头了就容易出大问题。党员会议结束后，又召开了大小队干部会议，白天召集到公社搞粮食核产，晚上回到生产队安排生产。他很少参加会议，都是找队干部个别谈心，使基层干部减少压力。如江州、板崇几个产粮大队，干部思想包袱较重，便请他们一起喝酒，边吃边谈心，使他们心情舒畅。但有些公社干部还不领会他的意图，便对个别大队和生产队施加压力，制造假产量。如保安大队虚报假产量，还要公社组织干部去参观他们的核产“成果”。当甘苦亲自到现场时，发现谷囤上面放些好谷，谷囤下面全是谷壳，他便找住在这个大队的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谈心，并批评说：产多报少是瞒产，产少报多也是瞒产，总的都是瞒共产党，都是不对的。他又对公社领导说，要注意这些苗头，搞这些点子，不但不能完成任务，而且将要出现政策偏差。由于甘苦的正确领导，江州公社在“反瞒产”运动中，从始至终不开过一次批斗会，过后又没有因粮食问题饿死人，保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很快恢复了生产。在经济极度困难的1960至1961年，甘苦同志率先垂范，带头克服困难。在县机关工作或开会，他总是坚持参加职工集体食堂，与广大职工同食“瓜菜代”。在下乡蹲点或检查工作时总是到群众中同食、同住、同劳动。1962年5月中央

批准恢复了原扶绥县的建制，崇左与扶绥分为两个县，甘苦仍任中共崇左县委书记。他前后在崇左县七年时间。群众普遍公认他的优点，就是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没有官气，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如1963年冬，他到左州公社黄村蹲点，他就在黄克志的家中住食。他刚到生产队的头一天，就叫生产队长帮他安排一头牛，一把犁，每天同群众一起去犁田，一干就干了四十多天，直到春节前夕，才收队回县城。

1965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增设一个河池专区，甘苦调上河池任专员，兼地委常委。仅一年时间，专区各项建设得到很大的发展。不幸，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运动暴发，他即受到严重的迫害。但是，他始终相信党和人民大众能给他正确的评价。在林彪集团覆灭后，他才恢复了工作。初时被调到柳江造纸厂任革委会主任。1973年才调回河池任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他不纠缠历史旧账，团结一致向前看。积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为了改变河池地区的面貌，调动各级干部掀起大打砌墙保土总体战，有效地防止山区耕地水土流失，保证粮食稳产高产，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为了推动这项工作，于1975年到宜山县洛东村办试点。他不惜辛劳，白天坚持参加劳动，晚上开好干部、群众会议。由于日长夜久，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但他没有因此而休息，仍坚持了三个多月。看到这个点有了成效，才愉快地离开了洛东村。

1976年，甘苦调任广西水电局局长、党组书记。1979年又升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负责分管计委、建委等部门工作，并继续兼任水利局局长，电力局负责人。在此期间，全国全区正在百业待兴和中心的转移之中。他为全区经济发展规划和交通、能源等基础建设及一批重点工程项目，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特别是抓好发展全区水电事业，走遍了广西的山山水水，各大中小型的水电站、水库、干渠，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水电系统，在他的领导下，兴建和维修了许多水利和电站，使农田浇灌面积有了很大的发展，使一批病险水库工程得到加固，大大的提高了工农业的生产能力。他关心人民疾苦，高度重视山区人畜饮水困难，因地制宜地扶持修建了一大批自来水工程和水井、水柜，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缺水状况。他组织科技人员，完成了红水河流域的勘测和规划，为红水河水电资源的梯级开发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大化，岩滩等水电站开工后，他每年都是亲临一至二次，看望在电站建设的干部工人，并与科技人员一起商量如何加快全区的水电建设。有一次，他冒着大雨从巴马瑶族自治县到岩滩水电站工地，这个工地已向他汇报了情况，但他还要到这个电站属下的砂石场去看情况。由于正在下着大雨，同志们劝他不要去了，但他坚持要去看到砂石生产的进度，才能知道工程的真实进度。因此，随行人员只好和他撑着雨伞，以步行到达工地。此时，雨越下越大，雨伞顶不住风雨，甘苦的浑身上下被雨水淋透，他还是坚决前进。到达工地时，看到皮带运输机的巨大吞吐量和碎石作业的高效率时，他才露出了笑容。

1985年6月以来，他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六、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他与常委会组成人员一道，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致力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当他开始主持人大工作期间，那些不法分子，乘着改革开放之机，进行贪污受贿、偷税抗税等经济犯罪活动，严重地妨

害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他主持常委会议时，认真听取区人民检察院关于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情况汇报和区审计署关于审计工作情况汇报后，立即作出关于打击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议和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决议。在起草决议草案中，他特别指出：“要把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抓紧抓好抓到底，要切实确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他对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不管在大会小会都说：“如果不反腐败，我们党和国家就没有希望了”。因此，他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把这个《通知》作为各级人大做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任务；要积极宣传贯彻到每个干部和群众，人人认真学法、懂法、守法、执法。他在各次会议的讲话中，都特别强调要清除封建“人治”的影响，确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从1988年1月至1993年1月，他主持区人大工作期间，制定了地方法规共31件，审议和批准13个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同时还多次讨论和修改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使全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有法可依。

1987年，北京和一些地方出现学潮，他在广西电视台连续发表了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的讲话，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号召全区干部、群众为维护社会安定，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区党委的具体部署，维护了全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在全国出现的政治风波被平息后，东欧出现了剧变，苏联发生解体。在这种世界变幻的形势下，他坚定按照中央指示，沉着应付，站稳脚跟，走自己的

路。反复带领干部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关心家乡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于199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前夕，他与革命老前辈张报同志回到扶绥县城欢度“七·一”。他在7月1日上午，在参加县直机关庆祝“七·一”会议后，于7月2日上午又和张报带领县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四大班子领导和县直各部委办局领导干部，前往松根岭革命烈士纪念塔祭奠和敬献花圈。在向烈士祭奠中，进一步讲明我们党的革命事业来之不易，希望每一个革命同志都要珍惜她，并与张报同志各朗诵一首诗。

张报诗曰：

松根岭上草青青，玉塔高标烈士陵。

剿匪有功捐碧血，制顽无畏献丹城。

安民卫国千秋颂，取义成仁百代馨。

凭吊英灵堪告慰，扶绥昌盛又升平。

甘苦诗曰：

三代宏图仍沿轨，马列主义添新辉。

锦绣河山天地稳，敢教周期率见鬼。

张报的诗，内容意义深长自不必说。甘苦的诗，是针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国内外的敌人也正在梦想以“周期律”来等待中国出现和平演变。指明中国共产党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定能够坚持沿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以非凡的革命气派藐视国内外的一些敌人，将随着我国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日益发展的时代而去见鬼。从而，鼓励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大胆地带领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甘苦同志当年除在家乡参加庆祝“七·一”活动外，还负责检查督促扶绥、崇左、宁明、凭祥、龙州等县的抗旱等工作。这年3至6月份，他走遍了左江流域以及山塘水库，为西部几个县抗旱救灾留下了辛劳的足迹。他看到扶绥县干涸的大地，便对县委领导说：我们要痛定思痛，今后要下些本钱多修建水库，打井引泉，发展电灌、机灌、浇灌工程。对于旱的地区，要扬长避短，发展蔗糖事业。由于在他的关心之下，我县糖厂不断得到扩建，于1993年全县甘蔗种植达到242495亩，93/94年榨季共产蔗1195222吨，进厂原料蔗为995400吨，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796元，成为旱区不旱，人民生活逐年提高。

甘苦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积极站在改革开放前列，连续当选为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并于1993年3月27日，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他一生忠心耿耿，不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他有四个子女，在中学毕业后，都是按照当时规定到农村插队劳动。以后也按照知青政策抽回，安排到工厂或单位当工人，如长子甘向民和二子甘向群，一个在宜山县食品公司卖过四年猪肉，一个在一家设备厂当普通工人，以后通过考试、学习才逐步提升，没有任何特殊的照顾。他经常对其夫人黄娟同志说：“我参加革命时便改名为甘苦，你跟我一辈子就要同我甘于受苦，不得贪图享受，要多想如何为党为人民做好工作。他在病危时嘱咐家人，将其骨灰撒进滔滔红水河之中。

甘苦的一生，在建国前为着民族解放事业敢于出生入死，在建国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到鞠躬尽瘁。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